

做了很多雜事的寫小說的人

——楊照 訪談

訪問及整理：李航

楊照用一句話定義了自己：「我定義自己的方式，叫做『我是一個做了很多雜事的寫小說的人』。」他說，雖然因為身份問題，在台灣有很多分歧，但對他來說，寫小說才是生活的核心。每天出門帶上原稿紙的習慣他已經保持了很多年，這樣他可以隨時把自己想到的東西記下來。然而，即使寫作的人是他最認同的一個身份，以寫小說為業終究會給他的生活帶來一些困擾。他坦言，只靠寫小說是養不活自己的，因此必須做很多雜事。他做過的各式雜事，又被分為兩類，一類用來取悅自己，一類用來服務他人。

讀書的人

「讀《白鯨記》多快樂啊，我上一次讀到現在大概有二十年了。可以（一邊）再讀一次，然後一邊教，真的很快樂。這是取悅自己。」在各講堂授課，堅持了十年，每年三十個禮拜，所涉範圍從西洋經典到中國歷史都有。他享受這個職業，因為教課給了他重讀那些經典的機會。曾經當學生做研究看過的那些經典，多年來左右著他接人待物之道。「從這樣的思想史背景與關懷出發，我不斷擴大對於這個領域的閱讀理解，在這個領域中讀過愈多的書，做過愈多的筆記，回頭重讀這些經典，就有了愈大的樂趣。」談起課堂，他始終覺得十分幸運：「讀書讓自己可以回到

一個接受知識的被動位置，重新感受當學生的那種謙卑。」

他慨歎出版的流水線上，生產的零件都是雷同的，扼殺了人的個性，導致出現了許多「郭敬明式」空而無物的作家。所以，當談及紅遍中國大陸的韓寒時，他認為，不論這種變化是好是壞，他始終是當今教育體系中的一個「叛逆者」，他寫作，開賽車，不同於同輩的其他人，卻做著讓自己快樂的事情。

理性的人

除卻讀書，在電台主持廣播節目，也是一件令他覺得十分快樂的事情。在電台的環境下，他有著很大的發揮空間。每天有一個人陪他聊天，他可以聊他覺得有興趣的話題，問他想要問的問題。總之，那些取悅他的雜事，是一類自然的生活方式。正如他在《理性的人》一書中道：「有一段時間，我對於工作上必須撰寫的新聞評論，極度不耐。同樣的問題，反復出現，也就反復成為我們評論的物件，然而對同樣的社會毛病，可能每次講出不一樣的新鮮道理嗎？道理就是那些，如果要刻意標新立異、語不驚人死不休，那講的就不是理性道理了。」

楊照的名字時常見諸報端，其筆下的政治評論以高產且犀利著稱。然而，他在訪談中坦言，自己「能不寫就不寫」，執筆此類文通常是人情所致，不得不寫。筆者試圖以明代的「言事官」（上書皇帝直言皇帝過失的官員，如海瑞）與他「政治評論家」的身份作比較。對此，他表示，不同時代背景下，議論政治的人的角色與形象已經大不相同。在明代，言事官唯一的物件是皇帝；而在如今這個相對開放的社會裡面，「皇帝」已經不存在了，有的只是以整個社會為依託的「觀眾」（Audience），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讀者。眾口難調，讀者群體的不唯一性，令他覺得「寫到山窮水盡」。

然而，最大的區別在於價值觀念。在「不殺言事官」的傳統影響下，明代言事官認為「因言獲罪」是一種光榮。然而正當當

代的炒作，言事官會刻意使用偏激的文字，以激怒皇帝。這一價值觀在楊照看來是扭曲的，他難以認可這種缺乏理性的文字。在他眼中，知識份子應該在社會中擔任「詮釋者」（《立法者與詮釋者》，鮑曼）的身份，而非嘩眾取寵。知識份子不似藝術家，以創造新事物為使命，而應如同以前的哲學家，以新的眼光去看待既有的事物。鑒於人們通常不去思考和感受已經存在的東西，指出問題、並引起社會注意的使命，知識份子當仁不讓。雖然是雜事，但是既然被歸類於「服務他人的雜事」，「理性」則理所當然地成為所恪守的信條。他不忘提及，言事官每月只需上疏兩三次，比如今寫政治評論輕鬆許多。

後記：作為一名公共知識份子，他不失坦率。閱人無數的他談吐風趣。在充滿變動的城市社會裡面，他始終試著用自己理性的文字去適應和改變社會，卻不失內心的自然，令筆者喟歎。他是一個理性的楊照，服務著他人；又是一個自然的楊照，取悅著自己。